

设计共同体能动性回归的本质探寻

董雅, 张郢娴

(天津大学 建筑学院, 天津 300072)

摘要:人们对设计的功能、形式以及经济作用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其本质内涵的关注。这种仅仅考虑设计产品本身而忽视其社会影响的设计思路的狭隘性显而易见。对设计的反思不能仅停留在对单纯的功能和形式的追求上,而应将设计的思维模式上升到对设计本质的探寻。设计共同体能动性回归的本质探寻就是对设计伦理道德的呼唤。由于对设计价值共同认可而形成的设计共同体,应该拨开设计外在的表象,去寻求设计的最终目标。设计最终应该服务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回归到真实的世界中,为需要帮助的群体进行设计。

关键词:设计共同体; 伦理道德; 大众需求; 人本设计

中图分类号: TU-8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1)02-0103-06

在当今社会中,设计活动已经拓展到整个人类社会和环境之中。然而在“设计”的名义下,大量无视整体利益、无视伦理道德准则的设计层出不穷,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设计”有时沦为一种“计谋”、一种“盈利工具”^[1]。在设计日趋商业化的今天,种种不道德、不负责任的设计行为滋生出许多社会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危机、无节制的过度消费、道德沦丧、人的异化等。无序混乱的设计已然开始破坏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活,影响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畸形发展使人们迫切认识到回归设计共同体能动性的重要性。

一、设计共同体及其能动性

1 设计共同体

在设计领域中,设计主体并非某个人,而是包含了设计师、政府、文化机构、企业、媒体、大众等多个团体,他们组成了设计共同体。每个团体内部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模式,他们从事不同的职业、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思维方式。可以说,设计共同体是在差异性与共同价值认可的作用下产生的。然而他们在设计生成的过程中

偶然形成了步履一致的同盟,并在对设计价值共同认可的基础上集聚到了一起^[2]。

虽然设计师所提供的设计文化是这一共同体的中心,但是政府对于企业和文化机构产生政策上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以美术馆为主的文化机构通过举办各种方式的展览将设计品呈现在社会各界眼前;企业将设计作为产品升值的手段,从而获取经济效益;媒体再将设计的一切信息传播给公众;公众虽作为这一过程的最后环节,但却是设计最终的拥有者和使用者,对设计的反馈产生重要影响^[3]。所以说,设计的生成不仅需要设计师和专业团体的努力和创新,而且需要非设计师组成的社会力量的介入。这些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作用于设计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说,设计共同体的每股力量都决定着设计的发展与进步。

设计共同体主要体现了设计的社会性,设计的社会性意味着设计不是个人行为,但是设计的矛盾也在于此。对于一个设计项目而言,设计的专业操作充满了设计师的“个人性”,但是设计最终要回归的日常生活又充满了社会性和公众性,这需要设计共同体之间有充分的沟通和理解。对于设计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环节,应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而相同的价值体系正是设计

收稿日期: 2011-03-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F45)

作者简介: 董雅(1957-),男,河北辛集人,环境艺术设计系主任,教授,从事环境艺术设计及理论、景观与公共艺术设计研究;张郢娴(1985-),女,河北唐山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环境艺术设计及理论研究。

共同体形成以及设计主体能够在设计中发挥良好作用的基础平台。同时设计要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要平衡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一个好的设计应该在企业、社会和设计师的个人理想之间取得好的平衡点,应该均衡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等的平衡永续的发展。

2 设计共同体的能动性

设计共同体的能动性不仅仅体现在对自然和人造世界的改造上,因为设计作为一种塑造人类生活和人自身的活动具有强大的力量,在改造的过程中除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外,还应该呼唤一种设计的自律和自觉。设计共同体需要在各方利益的抉择中以人类永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为最高原则。设计共同体的能动性还体现在要为更多需要设计的人服务,要去寻找和面对真实的社会中需要设计的领域和需要设计的人群。因此,设计共同体能动性回归的本质探寻,实际上就是对设计伦理道德的呼唤。由于对设计价值共同认可而形成的设计共同体,应该拨开设计外在的表象,去寻求设计的最终目标。

二、设计中道德话语的缺失

在今天的社会中,人类尽情地沉醉于自己精心设计的世界里,大众一直被动地接受设计师所创造的一切事物,不管其是否适合自己的生活使用需求;而设计师也沉迷于自己对大众生活绝对的领导位置,他们引领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此外,权力的介入、肤浅的利益追逐、无休止的物欲追求、急功近利的建设等导致设计衰败、道德沦丧和资源的无限浪费,设计目前完全处于受控之中。

1 技术理性崇拜

科技的迅猛发展已成为人类的无限推动器,瞬间改变了世界。然而人类对这突如其来的发展还未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之时,便开始陶醉于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工具进行各样的创造。它的进步虽带给人类极大的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使人们逐渐被包围在工具所创造的世界中^[4]。

当代设计理性困境通过物的逻辑和设计理性逻辑取代人的主体逻辑而达到极致,设计沉迷于科技的无所不能和震撼的视觉效果,忽略了人

的生存主体性。当国外在忏悔高层对人的生活带来各种弊病时,我国的摩天大楼却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它的崛起和盛行表明了人的生存理性最终被导向完全的技术合理性的控制中,而摩天大楼本身所体现出的象征性和炫耀性把设计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理性形式。金茂大厦的结构工程师法兹勒·康(Fazlur Khan)曾说过,今天建造 190 层的建筑已没有任何困难,城市要不要盖摩天大楼并不是工程问题,而只是个社会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设计现代性的文化价值问题^{[5]186}。设计对结构和技术的崇拜,使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工具理性形式的附属形式。技术理性的不断扩张,使其占据了统治力量,成为了统治和束缚人的异己力量^{[5]184-185}。

人在高科技的光环下不能正确地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盲目强调对自然的改造和个人价值,逐渐从自然的主人沦为科技的奴隶。设计不再关注人的正常生活的居住和使用需求,这种崇拜技术理性的设计理念,致使人作为一种生存主体和功效主体的价值和需要被忽视,导致人类审美传统与伦理精神的失落。

2 设计的非平民化

商家与设计师的联姻使设计为大众服务的设计理念再度让位于为高端消费者服务。消费者成为设计的核心,购买力也成为评判设计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集社会地位、权力、财富于一身的上流人群对设计的需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设计平民化的发展。设计服务对象的变化,使设计师的思维模式也随之改变,他们以及雇主追逐的利润空间在高端人群之中,而普通的大众阶层以及低收入人群的日常生活却因他们缺乏相应的购买力而无人问津^[6]。

平民与贵族对“物”的使用功能的追求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而由于两个阶层巨大的经济实力的差距,使得设计物品在外在形式上的要求产生了天壤之别。设计师的作用在于能设计出体现权贵者身份和地位的物品,用以区别普通大众,满足他们独一无二的虚荣心。在投资商的鼓吹和诱惑下,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投身于设计高端奢华消费品的行列之中,设计出众多远离普通百姓生活、高于使用功能的奢侈品。

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中曾记载:“是故古之良工,不劳其知巧以为玩好。无用之物,

守法者不失。”这是说一个优秀的造物者应该把心思放在有用的物品上,而不是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创造无用之物^[7]。而如今,设计的伦理又何在呢?古语有云:“锦上添花故可贺,雪中送炭尤为贵。”设计为人服务中的“人”,不只是有权势的人,更多的是普通百姓。设计只有达到为大多数人服务,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3 人为地控制大众的需求

商品生产只有极大地刺激消费,才有可能赢得高额利润回报,所以生产商在追求销售额的利益驱使下,要求产品在推入市场后具有一定的流行期限,并把最新研发的产品作为保留产品,在旧产品推出一段时间后再上市。目的是让消费者觉得自己先前拥有的产品如今已经陈旧,需要激起消费者再次购买的欲望。这种消费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大批量生产、消费并大批量废弃的模式,致使产品的使用周期大大缩短。然而这种方法的实行并不是设计师个人能力所为,而是企业生产商、设计师、工程师、金融和市场专家等通力合作的结果,这使得设计的目的不再纯净。

设计源于对商业利益的追逐而进行的外观样式的改变以及对流行趋势的控制,让消费者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大批量消费品的制造致使资源浪费日趋严重,大量废弃的产品加剧了环境的污染。正是这些片面追求商业价值的设计导向,使人们陶醉于人为操纵下提供的丰富物质生活中,它催生了无限制的需求膨胀,从而更有效地刺激了商业设计的发展。

诚然,消费设计本身并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但当利润和消费成为设计唯一的追求时,当设计师变成资本运作链条上的一个零件时,设计则完全变成了一种商业营销手段,它严重腐蚀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人们不但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还在无形中加剧了价值观念的偏差,使设计丧失了对适应现代日常生活的新伦理观探索的意识,最终导致当代设计伦理的缺失。

三、当代设计发展困境探究

古代中国的造物水平不论在材质、技术、工艺还是功能、形式上都体现了当时世界最高水

准,然而为何到了近现代以后,中国所谓的“设计”逐渐沦为抄袭、批量生产、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其实这种困境和尴尬并不单纯是技术问题,背后隐藏的是社会问题和道德伦理问题。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的造物设计是按照当地各异的生活方式以及切身的需求进行的器物生产。在这种造物形式的背后体现的不仅是高超卓绝的技艺,而且还深刻地表达了同传统的生活、社会、道德和礼仪等一致的道德价值观念,它所基于的是久远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器进乎道”价值观念的影响下,造物背后塑造的是能引起所有人共鸣的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品质。然而,西方工业革命的爆发及现代技术的发展,致使中国不得不反思由于知识、技术上的差异所带来的差距,中国的现代化以及实施转向的现代生活是在被动与无奈之下模仿西方现代模式开始的。这导致在中国特有的背景之下展开的现代性和构建的现代生活模式,只片面地看到西方现代性价值工具的作用,而忽视了孕育它的背后的特定土壤。显然中国不可能按照西方现代设计的发展逻辑建立西式的价值观和秩序观。

从中国的现代性本质特征和设计发展困境来看,中国设计的现代化进程是非自觉地、被动地展开的。就内部来看,中国社会有意地引导了设计的现代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几千年传统的造物观和价值观被瓦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内部原有的秩序受到冲击,从而催生了设计的现代化。就外部来看,工业革命的爆发致使西方发达国家将现代性通过强大的技术理性价值植入中国原有的传统社会结构之中,导致了开始被迫地现代化。

在西方,设计是由大众日常生活合理性需要而建构和发展的,但在中国,设计的现代化过程是远离大众真实需求的。支配这种模式发展的是技术、经济、政治等多种力量的集合,从而使设计改变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的异化又进一步促进了设计的畸形发展^{[5] 308-311}。

四、为真实的世界而设计

“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古今中外的设计之

道。设计是为人服务的,设计行为的目的是指向普通的人民,设计行为必然应该是善行,而伦理道德则理应成为设计之物的客观属性。联系人、自然、社会间的设计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境界,除了要有客观外在的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外,更需要有设计主体严于律己、进德修业的伦理道德。设计应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并能够引导其进步,设计艺术的终极目标是使人的生活达至幸福的境地。因此,设计呼唤伦理回归,呼唤人性关怀的回归,这种回归要求设计把责任伦理看做是最低的标准和最终的目的,把人性关怀作为出发点,使设计回归到平衡人、社会、环境、资源等因素的关系之上,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目的。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人类的生活也开始回归它的本质:生活比生产重要。而设计作为人类实现目的的一种方法和手段,最终目标是解决人们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不论是城市、区域的规划,还是日常使用物品的设计,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以及服务系统的合理性、有效性才是设计的终极关怀。它将不再局限于产品、环境等具体的设计服务层面上,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商业的利益与促销,设计要想为更多的人服务就要回归到社会和公共生活的角度。

在设计所面对的服务领域中,有真实和虚假之分。所谓“虚假的世界”是设计完全服务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社会,设计被商业操纵和利用着,全然掌控在商家的手中作为商业噱头来为其服务。身为设计师和设计理论家的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 1927-1998)在其著作《为真实的世界设计》(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中指出:“最近的很多设计都只是在满足一些短暂的欲求,而人们真正的需要却常常被忽视。时尚能够通过对于‘欲望’的精心操控使人获得满足,但是一个人在经济、心理、精神、社会、技术和智力上的各种需要却往往更难获得,而且满足这些需要也不像时尚那样有利可图。”^[8]“真实的世界”所关注的是世界上很多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领域,然而,由于这些群体大都是在社会上没有身份地位、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从而被设计所忽视。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就是为第三世界设计、为残疾人设计、为穷人设计、为弱势群体设计,为艰苦环境下需要提供生存的人设

计等。细化到非常具体的领域中如教学用具的设计、实验室工具的设计、医疗器械的设计等。“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就是要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进行设计。他们的需要,才是真正的需要。而在“虚假的世界”中所谓的“需要”实际上是无止境的“欲求”。他们的真正需求早已得到满足,目前的设计只不过满足新富阶层的欲望。设计的目的不是为那些富人设计哗众取宠的“玩物”,更不是满足有钱人对于身份和地位的追求,而是要为那些被社会所忽视的人的真实需要服务。因此,设计应该服务于人的“真实需要”,而不是“无限欲望”^[9]。

2010年3月,在北京市六郎庄的一栋出租房内出现了八间“胶囊式”公寓(见图1),其设计者是一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他建造的初衷是希望为来北京打拼的流动人口提供一个暂时性、过渡性的居住地,希望能够用全部的精力为弱势群体做一些事情。虽然胶囊公寓每间的长和宽仅有2.4米和0.72米,但是这样的空间对那些低收入群体来说,既摆脱了合租的麻烦,又能花很少的租金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独立的住所。



图1 “胶囊式”公寓

自胶囊公寓问世以来,得到了有关人士的关注。然而大多数的评论却停留在对胶囊公寓的指手画脚上:有人说它的设计不够人性化,有人说它不是解决流动人口住房的最佳途径,有人说它缺乏对最基本的居住空间的了解、缺乏基本的调查研究等。不可否认,胶囊公寓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它的诞生却是年近八十岁的老人和老伴两个人的有限力量所建造的。抛开设计品质的好坏,其背后饱含着老人对社会问题的关怀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年近古稀的老人在社会

中原本就是该给予关怀的弱势群体,但是他们却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对同样的弱势人群倾注全部精力。然而,政府、企业、开发商、设计师这些有能力、有权力的高端人群面对大多数普通人群的生存需求,又作出了多少贡献呢?“胶囊公寓”这种怪现象的出现正是对目前社会的绝妙讽刺。

此外,在北京成府路的一个大院里,有一座两米来高的小屋像一颗巨大的鸡蛋矗立在草坪上,然而它并不是一个纯供人欣赏的公共艺术,而是供人居住的小屋(见图 2)。它的主人是一位刚毕业进入社会的青年戴海飞,有限的薪水支付不起北京昂贵的房租,但又要生存,于是利用公司的设计创意,自己制作了这样一座由竹条编织而成的蛋形小屋。虽然它看起来很温馨,但是由于“蛋壳”只有约一拃厚,屋里的温度几乎同寒冷的外部一样低(见图 3)。虽然主人很享受“蛋壳”里的生活,但是享受的背后充满几许无奈和挣扎。小屋面对被物业拖走的危险,他乐观坚韧的性格让人钦佩,然而背后付出了多少辛酸、承受了多少痛苦,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北京的冬天寒意逼人,而“蛋壳”里的生活更是让人备感苍凉。“蛋形的蜗居”里孕育的不是幸福,而是被扼杀的理想和青春。缺乏民生体温的“蛋壳”里,囚禁的是幸福和理想。



图 2 蛋形小屋



图 3 蛋形小屋里的低温

在这样一个繁华的都市中,设计的目光锁定的都是光鲜靓丽的现代文明,宣扬的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前卫奢华的享受。然而透过这些“蜗居”,我们无意中发现了城市繁荣背后的苍凉民生,尽管国家的经济发展日益昌盛,但是弱势群体却很少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蚁族、蜗居的出现反映的是底层群体为了生计而艰难地挣扎地生活。孕育蚁族的居所已在城市拆迁中化为记忆,但是贫困人群的基本生存困境却并未因此消亡。无论是胶囊公寓还是蛋形蜗居,都没有得到社会的帮助,这所有的一切的建造都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而艰难地为生计奔波。

从以上实例中可以看出,这些群体仍受制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在称赞完这些非专业建造者的创意之后,更重要的是应该给予底层民众生活困境的帮助,他们的需要才是“真实的需要”。设计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些人的生活。设计共同体完全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各种服务,从而满足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所以说,设计应该延展到广义的社会和公共领域之中,为更多的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

五、结 论

无论是古代的手工艺设计还是当代的非物质设计,无论是设计的起源发展还是终极目标,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念应该总是伴随着设计的始终。清华美院教授李砚祖说过,在设计缔造或预设的价值中,除了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外还包含伦理价值。“所谓伦理价值,是指伦理层面上的价值,即最高价值,这种最高价值实际上是设计的目的本身,即为人的生存、生活服务,使人的生活达至幸福的境地之目的,此为‘至善’。通过设计这一手段、工具,而使人生活得幸福,这应是设计的终极价值、最高价值。”^{[10]9}只有在此基础上并超越了功利境界和审美境界的界限,而寻求到功用、审美与伦理道德和谐统一的至高伦理境界,设计才能为人类和社会发挥其本质作用。

设计要回归伦理道德价值,虽然设计师的责任在整个环节中占有很重的分量,但同时更需要非设计师组成的社会力量的介入和参与。设计中各种问题的出现,不能把责任都归罪于设计

师,在设计共同体中,政府、企业、甲方、媒体等相关机构在设计的传播过程中都能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构筑起对设计价值的认同。设计共同体为大众对设计的认可提供了适合其生存成长的土壤,而设计的认同又促进了设计价值的实现。

设计自从它诞生的那时起,就是以人的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设计固然离不开科技、社会和经济等影响因素,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失去本质的道德内涵。设计的最终目的不是追求最高的经济效益,而旨在创造一种人与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环境。伦理道德的约束是无形的,但也是伴随着设计的始终。在物欲纵横的市场经济中,更要坚守人类的精神家园。只有合乎道德的设计,才能推进社会文明的进步,才能引起人类的共鸣。正如李砚祖所说,“设计的大千世界,如果没有‘至善’作为明灯目标,其混沌黑暗是难免的。但我们又可以坦率地相信:作为人类艺术化生活和创造智慧产物的设计,其主要的趋势是朝着‘至善’之目的不断前行的”。“至善的目标应是高悬在设计之路前方的一盏明灯,它既是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又是一个方向、一个终极之目标。”^{[10]9}“至善”指向的是设计的目的,即为人的生存和生活服务,并使人

的生活通向幸福的世界。

参考文献:

[1]刘卷.论设计伦理道德的理性回归[C]/创新·设计·管理:2009清华国际设计管理大会论文集.2009:257-259

[2][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8

[3]季倩.设计之城:一种文化生成的场域研究[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09:97-100

[4]胡鸿,舒倩,韩宇翊.设计伦理与当代设计[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5,(SI):50-55

[5]海军.现代设计的日常生活批判[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04

[6]胡飞,喻晓.为城市低收入群体而设计:以拾荒者为例[J].装饰,2008,(2):86-87

[7]陈剑.设计为人——一个中国设计的基本命题[J].美术观察,2010,(3):28-29

[8]PAPANEEK V. 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M]. Chicago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rs 1985:15

[9]周博.行动的乌托邦——维克多·帕帕奈克与现代设计伦理问题[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08:66-68

[10]李砚祖.设计之仁——对设计伦理观的思考[J].装饰,2007,(9).

Research on the Essence in Returning to the Community of Design

DONG Ya ZHANG Ying-xi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People put more importance to the function, the form and the economic sectors than the essence of design. It is obvious that design which considers the product itself and neglects the social impact is narrow-minded. The reflection on design does not only concern the function and the form, and the thinking model for design should be promoted to the pursuing of the essence. To pursue the essence in returning to the community of design actually is to call for the sense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The community of design for the common value should pursue more the essence of design than the superficial comprehension. Design finally should serve for the public daily lives and return to the real world to design what the group need.

Key words design community, ethics, public demand, human-centered design

[责任编辑 张莲英]